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王子今 杨倩如 撰

汉书解读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旗帜上赤，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汉书》解读

王子今 杨倩如 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书》解读/王子今，杨倩如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9949-8

I. ①汉… II. ①王… ②杨… III. ①中国历史-西汉时代-纪传体 ②《汉书》-研究-教材 IV. ①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2914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汉书》解读

王子今 杨倩如 撰

Hanshu Jie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82501766(邮购部) 010 - 62515195(发行公司)	010 - 62514148(门市部) 010 - 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34.5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74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做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目 录

导论	1
高帝纪（节选）	34
武帝纪赞	77
异姓诸侯王表序	81
诸侯王表序	85
刑法志（节选）	91
食货志上（节选）	118
食货志下（节选）	137
艺文志（节选）	163
贾谊传（节选）	172
韩安国传	192
李陵苏武传（节选）	206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228
张骞传（节选）	232
司马迁传赞	245
戾太子传（节选）	249
霍光金日磾传（节选）	261
赵充国传（节选）	294
扬雄传赞	319
儒林传序赞	324
循吏传序	331
匈奴传赞	335
西域传赞	343
李夫人传	350
元后传（节选）	358

王莽传（节选）	386
叙传（节选）	502
附录一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班固列传》（节选）	522
附录二 班固年谱简编	532
参考文献	539

导 论

一、《汉书》及其著作人

(一) 概說

《汉书》是《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在“二十四史”中列居第二。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汉书》是最为全面、完备的史籍。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基本沿承了《史记》的记载，但是由于作者历史观的差异，材料取舍标准不同，也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于汉武帝中期以后西汉历史的记述，《汉书》的文献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汉书》的作者虽然以记述西汉历史为任务，但是全书也包括刘邦集团反秦并创建汉王朝的历史，自然涉及秦史，对于新莽史的记录，也是大体完整的。《汉书》所记录内容的时间跨度，包括以下这些帝王统治时期的历史：

秦始皇帝嬴政（公元前 221～前 210）

秦二世嬴胡亥（公元前 209～前 207）

秦王子婴（公元前 206）

汉高帝刘邦（公元前 206～前 195）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 194～前 188）

高后吕雉（公元前 187～前 180）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 179～前 157）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 156～前 141）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40～前 87）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 86～前 74）

汉宣帝刘询（公元前 73～前 49）

汉元帝刘奭（公元前 48~前 33）
汉成帝刘骜（公元前 32~前 7）
汉哀帝刘欣（公元前 7~前 1）
汉平帝刘衍（1~5）
孺子刘婴（6~8）
王莽（9~24）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史书。全书共 100 篇，包括“纪”12 篇、“表”8 篇、“志”10 篇、“传”70 篇，后人又将 100 篇析为 120 卷。其中，《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是《史记》之后所新创。《汉书》的体例，对后来的纪传体正史影响很大，此后其他 22 部都是依照它而作。

《汉书》的突出特点是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汉书》，是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出版的，这是迄今我们研读《汉书》最方便的版本。

（二）西汉史的基本脉络

《汉书》主要以西汉历史作为记述对象。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大略勾勒一下西汉史的基本脉络。

秦始皇去世之后不久，秦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大动乱。秦二世没有能力稳定政局，其执政集团的核心又发生变乱，秦二世本人被赵高派人刺杀。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溃。

秦亡之后，反秦联军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项羽军事集团掌握了关中形势，主宰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再分配。项羽号称“西楚霸王”，然而没能够全面控制天下政局，诸侯混争的战火重新燃起。稳健多谋的政治家刘邦取得关中作为根据地，又得到诸多猛将能士的拥戴，终于战胜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政治形势依然复杂，经济条件异常落后，外族威胁空前严重。刘邦和他的功臣集团排除诸多困难，努力使西汉政权得以稳定。

刘邦去世后，西汉王朝经历了吕后专政的时代，随后进入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 39 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史称“文景之治”。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由急峻渐

而宽和、由阴暗转向光明。

汉武帝在位 54 年，是中国古代统治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作为胸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成果。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之后，西汉王朝经历了史称“昭宣中兴”的阶段，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表现出一种繁荣气象。

此后，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相继当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危局已经无可挽回。专制王朝走向衰落时的各种社会弊病逐步显露出来。不过，元、成、哀、平时代 56 年间，虽然政治腐败昏暗，经济水准依然在上升。

西汉帝国历经 200 余年的经营，至晚期虽然政治昏乱，民众多有怨愤之心，但当时社会经济仍然有突出的发展：汉成帝时代没有因战争导致的危难和劳苦，天下号为安乐；汉哀帝时代百姓富裕，人口增衍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户口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据，当时西汉王朝设置郡县直接统治地区的户口总数为 1 233 062 户、59 594 978 口。^① 这一数字尽管难免有虚报或隐漏的成分，但还是公认的现存历代户口数中最精确的数字之一，足以说明当时的经济水平。

王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和两汉之际社会大变乱的历史相叠合。在西汉末年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王莽以外戚身份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逐步取得高位，最终代汉立“新”、登基称帝。他执政之初，继承了汉朝承平之业，边境和平，国家储备充足，社会也比较安定。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王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但他的努力大都惨败，导致了全国性的民众起义，起义

^①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32～33 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推翻了新朝政权。王莽的政治实践以失败告终，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议纷纭。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创获和历史经验，以及对于后世所提供的可贵的启示，是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重视的。秦汉时期的主要历史特征在西汉时期已经有比较集中的体现，“这一切都被东汉初大史学家班固写进《汉书》这部巨著之中，他以宏伟的气魄，雄健的笔力，绘制成西汉一代兴亡的巨型历史画卷”^①。

（三）班固的人生道路和史学实践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9岁能文。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入洛阳太学。建武三十年（54），班固的父亲班彪去世，班固自太学返回家乡。班彪曾经作《后传》数十篇，准备将《史记》续写到西汉末年。居忧时，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年，《汉书》基本完成。班固用了20余年时间，继承父业，完成了这部记述西汉历史的史学专著的绝大部分。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用这样的笔调记述班固编撰《汉书》的情形：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班固的著史工作并不顺利，不久，即有人上书汉明帝，说班固私自“改作国史”，诏令传达到地方，班固被逮捕投入京兆狱，书稿被没收。此前有扶风人苏朗诈言“图谶”，下狱死。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他被地方司法官员审讯，不能自明，于是昼夜兼程驰行到京城，上书御前，详细说明了班固著书的缘由和意向，同时京兆狱的报告也呈送到京师。汉明帝惊异班固的行为，上召到校书部，任为兰台令史，令其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

^①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一同完成《世祖本纪》。之后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又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历史事迹，作列传、载记28篇上奏，于是，“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班固从受诬入狱到授职修史，堪称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出值得回味的悲喜剧。”^①

由此可见，班固的历史撰述与司马迁有明显不同。他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最高执政者的认可，有的内容甚至是在接受皇帝指令的情况下进行的，有相当多的篇幅曾经在完成后即“奏之”。及时呈上皇帝，有接受审阅的意思，因此《汉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正史。这部史学巨著的完成，确实体现出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史学大家的思想和学术个性。《后汉书·班固传》这样评述班固著《汉书》的成就：

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汉书》的撰写，除了补充司马迁《史记》的记录而外，也有意表现与司马迁《史记》不同的历史理念。《后汉书·班固传》说：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班固不仅要补足《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缺憾，尤其不满意司马迁将汉王朝皇帝的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应当承认，班固《汉书》的处理方式，是符合正统王朝的政治意识的。《汉书》之后的正史，都继承了班固《汉书》的定式。但由于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了文化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其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较《史记》逊色。

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年“始弱冠”的班固“奏记说苍”，提出了任用“贤才”、“明智”的建议，被刘苍采纳。《后汉书·班固传》记述了班固和最高权力者之间“见亲近”、“愈得幸”的关系：

^①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3页。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官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对于当时朝廷最重要的边疆与民族问题，班固也曾经提出过政策建议。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任班固为中护军，随行参议军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临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著名的燕然山石刻文字，就是班固撰写。事见《后汉书·班固传》：

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

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在窦宪作为外戚集团首领败亡之后，班固被免官：

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有学者这样记述班固最终的悲剧结局：“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① 班固政治生命之荣枯，受到窦宪势力的影响。然而论者以为种兢“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的说法，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班

^① 吴树平：《班固》，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固诸子与家奴依恃窦宪集团“多不遵法度”，致使地方治安承受压力，也许确是事实。

南朝刘宋学者范晔在《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班固传》附于题下）的最后，以“论曰”的形式对班彪、班固的生平和事业有简略的总结，并且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篇末抒发了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文化生涯与文化贡献的感叹：“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范晔赞美班彪、班固的胸怀文采成就了《汉书》这部史学名著，其史家的良知和正义感可与司马迁、董狐比肩，其文字的精审和雅致则与司马相如和扬雄相当。班彪心识“皇命”，有《王命论》传世。班固则为世间权力纷争所迷惑，不免令人遗憾。是故有学者认为：

班固含冤被害，值得人们为他洒下同情之泪。然而他的悲剧结局也给人们留下了教训。他作为世家子弟，怀才不遇，不甘心家庭衰落，对功名利禄不能淡然处之，这确是他性格的弱点。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对于前代人物的遭际得失往往能看得清楚，评论恰当，而对于身边潜伏的巨大危险却不能洞察，因此种下祸患。这不仅反映出他认识的局限，而且说明依附权贵之险！^①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写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说明班固死后，由马续补修《天文志》。而据吴树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撰写的“《汉书》”词条，“班固卒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意谓班昭和马续共同续修了

^①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37页。

“八表”和《天文志》。亦有学者认为班固在世时已完成了“八表”和《天文志》的绝大部分，班昭和马续仅进行了一些修订。^①对此学界尚无定论。

班固是一位具有全面才华的学者，也是一位丰产的作家。据《后汉书·班固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明代学者张溥将班固《汉书》以外各种文体的作品 41 篇辑为《班兰台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1991 年出版的《班兰台集校注》，是目前所见最完备的班固著作全集。^②

作为汉代著名的文化世家，班氏家族在其故乡扶风受到推重，历代祭祀不绝。《扶风县志》载，明清时期在此地建有乡贤祠、三班祠、四班祠，以纪念班彪、班固、班超、班昭等古时乡贤。此地还有名为“班家台”的村落（今名南台村），据说是班固的家乡。班固墓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太白乡浪店村，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③

二、关于“《汉书》学”

（一）东汉魏晋的“《汉书》学”概况

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基本范式，讲究对古书的注疏，也就是对原文的注释和疏证。以这种方式对《汉书》进行研究，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学习和研究《汉书》，必须重视历代《汉书》研究资料的参考价值。

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经开始为《汉书》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更多的《汉书》音注研究论著。唐代学者颜师古汇集前人 23 家注疏，完成了《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汉书叙例》列有《汉书》注家凡 23 家：

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传无所存，具列如左：

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① 参见冉昭德：《班昭、马续补作〈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志疑》，载《光明日报》，1963—02—24。

^② 参见张溥辑，白静生校注：《班兰台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③ 参见秦川：《汉班固墓记》，载《文博》，1993（1）。